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王铭铭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社会人类学与
中国研究

王铭铭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王铭铭著. -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028-3

I. 社… II. 王… III. ①社会人类学-研究 ②社会人类
学-中国-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73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 数 236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6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凡 例

1. 本书的外文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一般均依据国内通用译法译出并在首次引用时加注原文；
2. 国外汉学家译名分成两类：(1)有一些汉学家取了汉文姓名，如 Marcel Granet 自己取名“葛兰言”、William Skinner 自己取名“施坚雅”，笔者即不另行音译；(2)其他人名原本未取有汉名，则根据通用译法译出，如“Maurice Freedman”译为“弗里德曼”；

为读者查阅之便，特列本书提及的主要汉学人类学者译名（以原姓氏英文字母为序）如下：

Emily Martin [Ahern]	马 丁	Daniel Kulp	库尔伯
Hugh Baker	裴达礼	Daniel Overmyer	欧大年
Myron Cohen	孔迈隆	Burton Pasternak	帕斯特耐克
Kenneth Dean	丁荷生	Jack Potter	波 特
Prasenjit Duara	杜赞奇	P. Steven Sangren	桑格瑞
David Faure	科大卫	Kristofer Schipper	施珀尔
Stephan Feuchtwang	王斯福	Helen Siu	萧凤霞
Maurice Freedman	弗里德曼	G. William Skinner	施坚雅
Bernard Garlin	葛伯拉	Barbara Ward	华英德
Hill Gates	葛希芝	James Watson	华 生
Marcel Granet	葛兰言	Robert Weller	魏 勒
De Groot	德格鲁特	Arthur Wolf	武雅士
Steven Harrell	郝 瑞		

3.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设有“章后注”和“本书主要参考文献”栏目。章后注包括两种内容:(1)引文注释;(2)一般说明性注解。为了避免重复,引文注释所引及之中外文书目只注明作者、出版年代、书名、页码,不加注出版社及出版地点,所引及之论文则注明作者、出版年代、论文题目、刊载杂志、期号。参考文献较为全面地注明所有引文的作者、出版年代、书/论文题目、出版社、出版地点等细节,以便读者进一步查阅。
4. 为了区别同一作者在不同年份所发表之作品,全书所有引文注释及参考文献均在作者人名之后标出作品出版年代;
5. 书后之参考文献目录的排行均以中外姓名拼音之第一字母次序为准。

引 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话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多种理解中，最常见的是：从他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可贵的教益。对于社会人类学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从学科传统来讲，社会人类学的目标是通过“异文化”(other cultures)的探寻获得对“本文化”以致全人类的理解并从这种理解中寻找文化沟通和反省的道路。

作为研究本土社会的社会学者，“他山之石”的向度更加不可忽视。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过分沉浸于社会和人文类型的建构，在“本土化”口号之影响下，他们也可能否定“异文化”视角在本土研究中的地位。正如对于“异文化”研究者(如研究东方的西方人)来说最大的陷阱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所造成的文化偏见以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超离社会的想象一样，对于“本文化”研究者来说，潜在的危险在于受我们司空见惯的文化模式所迷惑以及排他心态所引起的自闭。诸如此类的文化隔阂衍生的表述危机，是目前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人类普同性和多元文化范式的调和，表面上是一句空泛的漂亮口号，但却是人类学自其产生以来迄今一直无法回避的工作。

本书是一部有关作者的“本文化”的述评性作品，它的关切点是对“我的社会”即中国社会的理解。对于此一关切点，不同

的学者已经从不同学科和理论方法路径加以阐释。但我的意图是通过总结别人的某些看法来表述自己的意见,而在众多的“别人的看法”中,我所选用的是国内外社会人类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相继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把中国当成是“异文化”的西方人类学者的看法。这些看法被总称为“汉学人类学”(sinological/Chinese anthropology),即对汉人或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叙述本人对这一系列研究的评论时,我显然是想把它们当成“他山之石”了。不过,在这里,“他山之石”的意思并非对西方理论的无端欣赏。在介绍这些看法时,我的目的不在于为读者提供一本“西方汉学人类学导论”。本书的七个章节各有各的主题,每一章针对的是我认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理论范式。我的意图是运用述评性文论结构,反思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此外,我之所以说“本书不是一部西方汉学人类学导论”,还有另一个原因:尽管本书评论的理论多为在西文出版物中出现的观点,但是我也力图把现存的“本土人类学”(native/indigenous anthropology)观点和研究成果反映出来,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和潜力加以讨论。

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主要考虑是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我还想通过此书的写作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一个交代。第一章是对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关系的简要评论,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路径”,提出社会人类学与汉学人类学之间关系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总结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理论,但是也试图把它们放在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问题中讨论,其中涉及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将与中国

人类学未来面向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章是对被称为“汉学人类学导师”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的评述,其焦点是中国宗族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分析的内在困境,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社会”转入“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方法论和理论独特性问题。第四章评述的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国乡民社会之经济人类学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与中国社会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独特性有关,但是,其切入点是“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模式的弱点。第五章概括了社会人类学者对中国宗教和仪式的论述,并力图从这一概括中提出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并主要涉及武雅士(Arthur Wolf)、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萧凤霞(Helen Siu)等人的理论。第六章从近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转变和“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出现观察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危机,重申“汉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理论背景。第七章是围绕“本土人类学”展开的,其前一部分是有关在西方出现的本土人类学潮流的概观,后一部分则是对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评论。通过国内外本土人类学的比较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我试图为中国学界未来的发展提出若干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后,我把有关本人近年研究的介绍和一篇近作放在两个附录中,供了解本人近年力图实验的主要研究取向。

五十六年前,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为费孝通著《江村经济》(1939)一书写的序言中预期:未来的人类学发展可能会以中国研究为开端,进入一个复杂社会(相对于原始的简单社会)、本土社会研究的时代。在马林诺夫斯基发表此

一言论后的二十八年，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主任、中国学家弗里德曼，在马氏纪念演讲会上宣读了一篇名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1962)的论文。在文中，他对马林诺夫斯基的预言作出热情的回应，论述了中国学为社会人类学所能作出的具体贡献。但他也明确指出，中国在人类学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有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因而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反历史倾向运用到中国的研究中，便显出明显的局限性。

弗里德曼的发言与逝去的学术大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方法论的对话：后者宣扬社会人类学社区调查法的有效性，而前者则对此提出质疑。后来，弗里德曼成为研究中国的西方人类学家(或称“汉学人类学家”)共同推认的学术导师，虽然他在1975年过早去世，但是其影响持续不衰，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方法论困境作出了向导性的精辟论述。汉学人类学界至今仍然在他的悖论荫庇下探寻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后继者们在运用和修正弗里德曼理论的过程中，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方法论，但是他们毫不例外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与马林诺夫斯基研究过的西太平洋岛民文化、与其他人类学家研究的非洲部落不同，因为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它的社会长久以来存在分化、它有国家与社会的并存、中央与地方的分立和揉合。

在弗里德曼之后，西方汉学人类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现在这一门区域分科的研究者数目比以前多得多、出版物显著增加、研究生数量空前扩大。然而，汉学并没有像非洲学、西太平洋学、印度学那样，获得人类学界的共同关注。从事其他区域研究的人类学者把汉学人类学看成是一门深刻的学问，但是他们不承认其研究的社会科学性，也不期待从中提取有益于学理

论发展的概念。在一般人类学者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与写作方法论实验。相比之下,汉学人类学的局面却是十分冷落,研究中国的社会人类学大多仅仅是把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理论搬到中国运用,只关心中国社会的解释本身,而不像弗里德曼那样力图从中国研究推论出一种人类学的新类型。他们以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从中国研究推导出来的看法,不适于其他社会。同时,他们对西方人类学和中国本土人类学的对话毫无兴趣,他们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本土人类学便荡然无存,谈不上对话。新一代的人类学者似乎忘记了,弗里德曼曾说过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恰好可以形成人类学悖论。

如果马林诺夫斯基还在世的话,那么他将会哀叹他的预言尚未实现:一方面,中国的文明社会模式并没有在人类学界真正地站起来;另一方面,他的学生费孝通所开创的本土人类学不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中国延续下来,而且在西方也没有成为文化观念对话的一部分。因此,不管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方法是否值得继承,他对中国人类学的期待仍然需要数代人的努力去实现。从这一个角度看,中国人类学目前的努力就是面对这个近乎古老的期待而展开的。作为一位中国人类学的学生,在将近十年的研习中,我始终受到这个期待的鼓励与指导。

本书是我在这个期待下所作的努力的部分成果。它不是一部系统化的学术概论,它所包含的七个章节均有各自不同的主题,这些章节的安排也不以它们的学理连贯性来体现。不过,我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将会对社会人类学本身以及汉学人类学的概貌与存在的问题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具体地说,有关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可以提供我们了解人类学路径之参考,而费孝通等人的“社区论”、弗里德曼的宗族论、施坚雅的区域

系论以及不同学者提出的民间信仰理论,则系国际学术界认定的汉学人类学主要理论,也是海外人类学教学中“中国社会与文化”或“中国民族志”课程的主修选题。在讨论这些理论时,我力求按照它们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加以梳理,使本书显得有点像是一本理论与方法教程。

不过,在写作本书时,我也力图表现近年成为我的特点的两条原则:第一,学术评论不应是武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批判;第二,学术研究应以开放性的讨论为主要形式。一些敏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在不同的章节对不同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质疑,似乎我的看法比以往的看法“先进”;另一方面,在全书中,读者无法把握我的自成一家的定论。如果说本书存在一个统一思路的话,那么这个思路并不是“结论”,而是对问题和困惑的表述。这一点与其说是我的写作的缺点,毋宁说是基于我的观点,我认为:程式化的定论固然容易为人理解,但无定论地提出问题并详加陈述对于学术讨论与社会理解也许更有价值。

文论的写作不等于对话。但是,本书可以说代表了我在中国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路径方面与海内外人类学前辈们的理论对话,它们是1987年以来我先后在伦敦、爱丁堡以及北京大学研习社会人类学和汉学的体会。我本人可以算是书中评论的学者群体中的后生者。因此,评论不仅对别人有效,对我自己也有效。在全书中,我尽量地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够逃避其他人类学者的困境。许多我在书中提到的学者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同辈,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不过,我确实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表述不仅能够符合学术对话的原有规则,而且能具有一定的创新之见。

在这个“学术应用论”流行的年代，很少人能够避免学术价值问题。如果说本书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价值不直接表现为其实用性，而更多地表现在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对社会转型的解释以及对本土学术的建构的参考意义之上。假使这些方面能够被承认为“有用”的话，那么我将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在近年的研究中，我已经把本书评论的一些理论放在实际田野工作中去验证和评判。

我接触社会人类学，是从阅读厦门大学已故林惠祥教授对文化人类学的论述以及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对社区研究、乡土中国的结构与文化变迁的论述开始的。不过，本书所包含的知识更多地直接来自于社会人类学的大本营英国。1987年，我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社会学人类学系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在该系有机会、有条件阅读各种社会人类学原著，并参加社会人类学当代潮流、社会人类学原理、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与象征研究、家族制度、汉学人类学等研讨课的讨论。经过大量文献与理论方法准备，我于1990至1991年在家乡福建泉州从事田野调查一年，获得大量资料，并依此写成博士论文。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还在闽台农村从事广泛的田野调查，力求通过地方性的深入探讨，以详实的人类学描述，回答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的组织特点何在？如果中国社会具有其独特性，规范社会科学论述是否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相匹配？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否对一般人类学有潜在的贡献？本土概念是否可以发展出社会科学概念？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是马林诺夫斯基曾预言、弗里德曼给予界说、几代人类学家为之奉献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到来的前提。诚然，正如中外学界所共同意识到的，“社会人类学

的中国时代”之到来,不能依靠遥远的、对中国社会变革没有参与欲望的西方人类学家来实现,而应由生活在中国社会、沉浸在本土观念中的中国学者推动。不过,在我们“可以攻玉”之前,“他山之石”却是不可少的。弗里德曼在他的“社会科学可以为中国研究做点什么”一文(1969)中主张:社会科学能为中国社会研究所做的,在于让后者获得自在的学术空间。也就是说,只有让中国社会研究本身深化以后,才谈得上中国学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弗里德曼以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证实了区域性研究与理论对话的重要意义。我从事具体的本土社会的研究,目的与弗里德曼所讲的不同,而在于通过本土社会研究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对话的潜能。

致 谢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及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硕士选修课讲授过,其第一稿于1996年5月完成,送交三联书店经许医农编审仔细批阅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由本人改成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有许多人对此书的构思和完成直接或间接地作出过贡献。我的工作单位是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社会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该所名誉所长费孝通教授对本人的研究工作给予了不可多得的鼓励,他对“中国学派”建设及对中国社会人类学的论述,是本书写作的学术指导思想。所长马戎、潘乃谷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照料以及对我的事业的勉励,他们提供的良好的工作环境,本书的写作将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他们把这本书当成是我归国工作两年的工作汇报。

写完此书后,我觉得最值得感谢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奉献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欧美人类学者,他们的作品是我的“田野素材”,其所给予我的助益均已体现在本书的章节之中,这里便不一一致谢。促成对这批素材加以直接接触的,是支持我前往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的中英友好奖学基金会(SBFSS)以及引我初步入人类学之门的陈国强教授。在伦敦大学,教我社会人类学概论与研究方法论的老师如David Parkin教授以及指导我研习汉学人类学的Stuart Thompson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而与我

在有关中外人类学关系问题上作过无数次对话的师友 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对于我的研究有着更多理解和启发。我借此机会向这些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铭铭 1996 年 12 月

目 录

引 言	(1)
致 谢	(1)
一. 社会人类学与汉学	(1)
1、社会人类学及其基本特点	(3)
2、汉学人类学: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探讨	(9)
二. 从民族志方法到中国社区论	(25)
1、太平洋民族志模式在中国的传播	(27)
2、社区研究的新试验	(36)
3、社区中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力量	(43)
4、小地方中的大社会	(56)
三. 宗族、社会与国家	(65)
1、“宗族范式”的谱系	(68)
2、弗里德曼的悖论	(73)
3、“边陲地区”的社会	(78)